

## 意义的优先性与符号建构的根据： 以《北京折叠》与《三体》为例

周海天

**摘要：**在符号学的研究领域中，意义出场和传递的逻辑是最根本也是引起最多争论的焦点，而种种争议都奠基于一个核心的根据，即在表意过程中，究竟是意义还是符号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一些符号学家们认为意义（所指）产生于符号（能指），另一些符号学家认为二者本身就是无法区分的。诠释学对意义起源的揭示为萦绕于符号学中的这一基本问题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从诠释学的角度看视，“意义世界”先验地为符号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基础，并成为符号构建意义的最始源的前提，它预先保证了日常世界，包括文学文本（语言符号）的可理解性。在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中，“意义世界”成为作家（发送者）、作品（信息）与读者（接收者）共同分享的前提。在21世纪中国的两部代表性科幻小说《北京折叠》与《三体》中，对模仿与创造的界限之争由来已久，其本质是对符号与意义之先在性的争议，这一论争在符号学与诠释学的汇通性视域中得到了解答。因此，对符号学理论根据和表意逻辑的考察与分析，架起了符号学与诠释学之间的桥梁。

**关键词：**创造，模仿，软科幻，硬科幻，符号学，诠释学

## The Priority of Meaning and the Basis of Sign Construction: A Study of *Folding of Beijing* and *The Three-body Problem*

Zhou Haitian

**Abstract:** The logic of appearance and transference of meaning are among the most fundamental and controversial problems in semiotics. All disputes are based on a core, namely, a sign or a meaning, which has logical priority in the process of signification. Some semioticians believe that meaning (the signified) comes from a sign (the signifier), while others claim that they are indistinguishable.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origin of meaning by hermeneutics provides another view of this basic problem in semio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s, “the world of meaning” provides an a priori basis fo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igns and has become the most original premis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ign meaning, which guarantees the comprehensibility of the world, including literary texts (linguistic signs). In literary theory, “the world of meaning” has become the premise for “writers” (senders), “works” (information) and “readers” (receivers). In the two representative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works *Folding of Beijing* and *The Three-body Problem*,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long-standing boundary between “imitation” and “production”, whose essence is the priori controversy over signs and meanings, has been well explained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semiotics and hermeneutics.

**Keywords:** imitation, production, soft science fiction, hard science fiction, hermeneutics, semiotics

**DOI:** 10.13760/b.cnki.sam.201901007

### 引 言

符号与意义的关系是符号学领域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更是符号学这一理论建构自身之合法性的根据。对符号与意义的逻辑优先性问题，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其中一种观点暗示意义产生于符号在系统中

的相互运动，如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就以“价值”（value）这一术语取代了传统的“意义”（meaning），认为符号的价值取决于其在符号体系中的地位 and 关系，而一种符号的价值又由符号体系中的其他符号决定。因此符号在索绪尔的理论中就如在进行着价值交换的货币一样。可以说，索绪尔的理论假设将意义局限于符号之中。

另一种观点则声称，意义在逻辑上是先在于符号的，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将符号学定义为一门跨学科的实践（practical）之学，而不是一门理论科学——虽然符号学的分析方式有时显得非常的“科学化”。艾柯认为符号学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他在《符号学是一门学科还是跨学科方法论》（Semiotics: A Discipline or an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一文中总结道：“存在一种符号学现象，即每次事件出现，人们就可以用它来撒谎——把事件指回（referring back）到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东西中。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符号学的现象，每次我们说起的都是一个‘可能的’世界。”（1978, pp. 76-77）艾柯的这一论断暗示符号学无法通过“符号-意义”这一传递模式在符合论上描绘出一个“真实的世界”，同时，他也暗示，“真实世界”在符号学的认知过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符号学的过程只是真实事件的“指回”。

在以上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中，哪一种更合理？是意义产生符号，还是符号产生意义？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一问题看作一个无限循环的圆圈，而忽略了找寻起点。所以，为了更好地分析这一问题，我们将采取以下几种策略。首先，本文将追溯符号学中此项争议的根源。其次，为了更具体地阐述意义产生的逻辑，本文将以 21 世纪中国两部代表性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与《三体》为例，探讨模仿与生产之间的界线，其本质是符号与意义之先在性的问题。第三，本文试图在探讨意义出场与符号生产的问题上为符号学与诠释学构建起一座桥梁。

### 一、模仿与创造起源之争中的符号学问题

在符号学中，关于意义与符号的优先性之争论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实际上，古希腊哲学中模仿（mimesis）与创造（productive science）之间的争论的本质就是意义（模仿）和符号（创造）何者为先的根源。众所周知，“模仿论”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概念。柏拉图在讨论文艺的教化功能时，提出诗——喜剧和悲剧应当按照一定的规则模仿现实世界。柏拉图指出诗的创作中包含着两种方式：“诗和故事叙述，正如悲剧和喜剧，其中一种使用的技法完全是如你所说的‘模仿’；另一种是根据诗人根据自己的‘叙

述’(report)而写出的。当然,你会发现尤其是在酒神赞美诗中,还有另一种‘模仿’与“叙述”的结合,其在史诗和许多其他文体中也能找到。”(Bloom, 1991, p. 394c)显然,柏拉图把诗的写作分为两种技法:模仿和叙述。柏拉图并非排斥“模仿论”,他所反对的是没有章法和规范的“坏的模仿”,因为诗人使用不合规则的模仿手段将绘制出一幅扭曲的世界图像,不符合理想国中文艺的教化作用要求。

柏拉图之所以批评“坏的模仿”,是因为他用“相似”(与现实世界相似)而不是“同一”来定义模仿的本质。在柏拉图看来,具有相似特征的意象是真理的表层,正如意象和真相的对立:“你将不再看到我们所说的意象(image),而是真相(truth)本身。”(Bloom, 1991, p. 533a)对柏拉图而言,意象和真理是截然相对的,他认为哲学家的目标是寻找真理,而非徘徊于现实世界之意象的迷雾中。与此同时,对于理想国的公民来说,如果承担着教化功能的文艺缺乏章法,那么“坏的模仿”将不可避免地损害理想国的最终目的——获得最高的善。因此,柏拉图极力驱逐那些无原则地使用模仿这一手法创作的作品。事实上,柏拉图强调“坏的模仿”必须被杜绝,是以他对“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二分法为基础的,因此,在诗这一体裁中,大量被运用的模仿手法仅仅是理念的形象化,而理念世界是由不变的、永恒的和绝对的实体所组成的。换言之,模仿只是理念的图像和影子——“好的模仿”尽管有助于教化,但不意味着就可以通向真理,所以用模仿创作诗歌仅是物质世界和个体的精神状态扭曲的反映。

模仿恰恰与符号学中关于符号的概念息息相关。中世纪的学者把符号定义为“一物代表着另一物”,即“相似”。因此,如果柏拉图认为诗(广义上的文学)作为理念世界的“影子”(shadow)和“符号”(sign)是无法模仿,即传递理念世界的意义的——事实上,“影子”恰恰是符号与意义关系的一种隐喻,那么,文学中所使用的符号——语言,对文本和世界意义传递的有效性何在?该怎样定义符号学中意义的准确性?

“模仿论”并不是柏拉图文学理论的全部。实际上,在《伊安篇》(Ion)中,柏拉图也关注灵感的问题。尽管伊安作为诵诗人(rhapsode),并非诗歌作者,但是,诵诗人在朗诵时对诗歌语气、情绪和内容的表演也是一种创作和解释,更准确地说,伊安作为诵诗人是“第二作者”。对此,柏拉图描述了诗之创作中的意义传递链条:神—诗人—诵诗人—公民。其中,神恩赐灵感,意义的传递由神至作家、解释者再到听众中,在此过程中,诗人和诵诗人的创作是被灵感激发的,而非模仿。

“灵感理论”启发了亚里士多德。与他的导师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是一种创造（生产）能力。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存在一种自然科学，显然它与实践科学和生产科学是不同的。因为在生产科学中，生产的主体在生产者中，而非在产品中，它不是一门艺术，也不是其他的能力。”（Ross, 1924, p. 1064a）因此，中世纪学者们将《修辞学》与《诗学》归类到亚里士多德体系（Aristotelian Corpus）中的生产性科学（Productive Science），因为亚里士多德指出，艺术，包括文学的本质是创造，即生产，它是由能够运用符号的生产者创造的。

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亦将模仿与创造联系起来，使它们的界线逐渐模糊，在《诗学》中，他提到“模仿的媒介是节奏、言语与和声，三者要么是分开的，要么是结合在一起的。”（Lucas, 1968, p. 1447a）同时，亚里士多德把语言能力和推理的能力联系起来。在古希腊，逻各斯（logos）的最初含义就包括言语和理性，因此，模仿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人运用理性（言语）能力的一种结果：“模仿是人类从童年开始就有的天性——事实上，我们与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模仿得最多。”（1968, p. 1448b）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模仿”是人类理性能力的证明，其中包含着创造的因素。我们可以判断，不同于柏拉图，“诗歌是模仿”的判断在亚里士多德的体系中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在诗的创作的过程中，“模仿”实际上是一种可以体现人类理性（logos）能力的创造或生产。这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有价值的原因：“诗更像哲学，比历史更有价值，因为诗倾向于做一般性的陈述，而历史的陈述是特别的。‘一般’是指某类人可能或必然说或做某类事情。”（1968, p. 1451b）亚里士多德通过将模仿与创作结合，继承了柏拉图的教化观念中的精华。

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关于文学的本质的探讨——模仿和创作之争在现今的符号学理论中依然回荡着，具体表现为就符号与意义而言，何者在逻辑上具有先在性。实际上，广义而言，柏拉图意义上的诗包括了悲剧和喜剧，为现代意义上的“小说”（fiction, 或 novel）的开端。小说作为一种文类，其地位和审美范式初建于17—19世纪之间的，而现代小说理论在不同发展时期也有时倾向于“模仿论”（现实主义），而有时倾向于“创造论”（象征主义）。

当“创造论”影响下的小说理论家声称“作家为小说创造了一个完整的世界”（纳博科夫语），我们要问，如果小说中的形象被视为符号，那么它们如何传达意义？这一问题的答案似乎很明显，当然是通过在小说中词语、句子或段落的构建来传达意义的。然而，如果我们用一种更为具体的方式来提

问的话，问题就会变得更复杂了：创作是通过以语言符号模仿现实世界中的物体来构建小说文本的意义吗？这一思路意味着符号化的过程遵循着“物—符号—意义”的逻辑，语言符号是对现实世界中的事物的模仿，而意义实际上来自现实世界中的事物或现象，符号（语言）则只是一个空壳。第二种模式是，小说文本中的符号可以自我编织成一个网络，从而彼此交换价值。如此，意义产生于语言符号间的关系和位置，这就是“符号—符号—意义”模式，虽然符号在现实世界中仍然与对象相连，但在符号化的过程中，世界并没有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种观点认为，意义是决定语言符号功能的前提。正如柏拉图以反问的修辞方式提出的：“如果作品的图像出现在某处，水中或镜子里，我们在了解事物本身之前不会认出它们，但它们都属于同一种艺术和学科，这难道不是真的吗？”（Bloom, 1991, p. 402b）显然，柏拉图意识到对事物的理解和解释的先见（我们可以称之为意义）可以调节符号的意义。在这种模式下，我们可以说意义是预先存在的。

以上三种观点似乎是不相容的，因为第一种观点认为模仿是以对象为前提的；第二种观点认为，生产/创造理论是建立在“从符号到符号”的基础之上的；第三种理论也是一种模仿，即柏拉图的观点，理念或意义作为抽象概念是预先存在的，符号只是一种对理念的模仿和倒影。那么，哪一种判断更接近于文学文本中的意义传递逻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将以 21 世纪的两部科幻小说为例进行讨论。

## 二、“软/硬科幻”小说中模仿与创造的界线

在争论符号与意义的优先级后，我们总结出在文学创作中出现的三种表意图式。为了确定哪种图式更为合理，有必要研究符号学中的核心问题，即文学文本的意义到底是来源于模仿还是创造，其间界线又如何确定？

本文选择科幻小说这一特殊的文学体裁来说明上述问题。科幻小说被研究者们定义为是由作者所创造的一个“充满想象的陌生世界”，与其他文学类型不同的是，科幻小说的目的是通过语言符号的运用使那些毫无意义的“世界”传达出意义。那么在科幻小说的创作中，作家是如何使读者理解语言符号所传达出来的意义的？换言之，科幻小说是通过语言符号模仿现实世界，还是通过语言符号创造了一个新的意义世界？二者的区别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意义或符号的优先性。

在 21 世纪的中国，科幻小说基本上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硬科幻”

(hard science fiction)<sup>①</sup>，另一类是“软科幻”(soft science fiction)<sup>②</sup>。这两种科幻小说的分类取决于其文本中所包含的对科学技术进行叙述的数量和质量。一般而言，硬科幻强调科学性，而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软科幻，通常都更关注社会现象，而不是科学技术。

那么是否意味着硬科幻常常使用创造的方式，而软科幻则多模仿？事实上，在《北京折叠》与《三体》这两部具有代表性的科幻小说就展现了以上问题中的张力。在郝景芳创作的《北京折叠》中，大部分场景的构建都是通过模仿现实世界完成的，读者在阅读时很少被“陌生化”所困扰，他们可以快速和轻松地进入小说的世界，由此我们以把《北京折叠》定位为软科幻。然而，《北京折叠》作为一种社会学的隐喻，仍然创造了一个想象性的“可移动的空间”。郝景芳描绘了“北京”这一城市中的三个空间，分别对应于三个阶级：底层社会、中产阶级和统治阶层。为了保证统治阶层的最佳居住和生活体验，三个空间每天都在进行着地理上的转移。

三个“可移动的空间”消除了三种阶层之间交流的可能性，而三种阶层之间的隔离和世袭已经世代相传。然而，这种隔离被老刀的冒险撕开了一个口子。处于底层的垃圾清洁工人老刀为了给他收养的女儿缴纳幼儿园的学费，不得不冒险以偷渡的形式从第二空间（中产阶级）发送一封情书到第一个空间（统治阶层）。这时，老刀引导读者穿越了三个空间，揭开了其中巨大的差异：一方面是底层社会中令人窒息的艰难的生活，例如，老刀冒着巨大的风险送信，而底层的邻居女孩为了一点小钱而牺牲尊严，底层社会的生活显得极其“重”；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和统治阶层之间的多愁善感、婚外恋关系，又是那么的“轻”。

显然，三种“可移动的空间”是一种社会学的隐喻和批判。《北京折叠》通过地理分布与社会阶层的勾连，把阶层固化和贫富差距等近些年热议的话题具体化了。根据一般的定义，“隐喻”意味着两个概念之间具有隐藏的相似性。在《北京折叠》这一案例中，“可移动的空间”就是对 21 世纪中国社会问题的模仿。通过模仿而非创造，《北京折叠》传递出像现实小说一样清晰的社会学意义（意指）。事实上，如果去掉“可移动的空间”的这一隐喻，《北京折叠》将成为一部社会学报告或现实小说，而非软科幻。可以说，《北京折

---

① 1957 年，斯凯勒·米勒 (P. Schuyler Miller) 针对约翰·坎贝尔 (John W. Campbell) 的《太空岛》(Islands of Space) 写作书评时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

② “软科幻”这个与硬科幻类比而成的互补性术语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学者彼得·尼科尔斯 (Peter Nicholls) 提出的。

叠》通过语符来传达意义。然而，正如其他软科幻一样，《北京折叠》只是通过空间转换这一文字/图像符号的隐喻来模仿现实世界中的事物或现象，从而构建小说中的世界。在《北京折叠》中，作者不仅通过语符来传达阶层固化这一社会学问题，同时，还传达出道德、良心和美等意义。那么，语言符号是如何模仿这些抽象的概念呢？这使得我们又回到了一开始的问题上，即哪一个是具有决定性和先在性的，是词语还是意义，是能指还是所指？

让我们带着这一问题转到另一类科幻小说中——硬科幻。21世纪中国最著名的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代表作品《三体》就是这一类小说的典型。在《三体》中，地球被一个叫作“三体”的外星文明发现，根据“黑暗森林法则”，三体人将在400年后入侵地球，而人类就在此种情况下做出种种应对。在第二部《黑暗森林》中，刘慈欣“创造”了一些新的科学技术概念，以期在文本中构建一个“好像是真实存在的”外星文明世界。例如监视设备“智子”。三体文明害怕地球上科学技术的进步，因此发送了一个名为“智子”的设备——一种AI监视器，以锁死人类的科技发展，进而减少地球上人们反击的可能性。尽管AI是一种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高科技，但是如“智子”这样强大如神的AI明显是文字符号创造出来的。另一个例子是“水滴”——一种外星的神秘技术。根据《黑暗森林》中的描述，当地球舰队与三太阳系探测器相遇时，地球上几乎所有的星际飞船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阵形，与之相对的是，探测器看起来就像：“一个金属实心镜状的‘水滴’，圆头尖尾，每个角度都是完美的，它比圆还要圆，地球上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创造出完美的形状。”（2008，p. 367）就是这样一个“水滴”，在几分钟摧毁了地球舰队。

与《北京折叠》不同的是，《三体》的叙事呈现出明显的创造性倾向。刘慈欣用语言符号生产了一个在逻辑上自洽的外星世界，同时，即使这一世界与读者的世界迥异，即小说中的外星科学、技术和世界都是不存在的，但读者也可以完全理解其中的意义。那么这一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断定作者所使用的符号（语言、概念和图像）是对现实世界中物体或现象的模仿。那么，这只是模仿的变异？还是说符号有其主体性，即符号能够建构意义世界？

第一种观点认为，“硬科幻”与“软科幻”一样，都产生于模仿，只是程度有差异，因为所谓的“硬科幻”小说仍然在模仿现实世界的对象和现象。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在科幻小说文本中，作者经常使用隐喻的修辞手法。前文已经论述，隐喻依赖于相似性，所以只有通过吸引读者去了解一些熟悉



的东西,《三体》才能通过语言符号来创造新的世界,换言之,创造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中生有”。可以说这种观点倾向判定意义先在,“模仿”不仅是对事物的模仿,更是对意义的模仿。

另一种观点认为,语言是先存的,因为语言是本体。正如本维尼斯特认为语言和社会的关系并非如先前的学者们所言,是部分与整体的“产生关系”,或者语言与社会为相互影响的“促进关系”,而是“构建关系”：“从符号学角度 (Semiological) 使这一关系颠倒过来,以为语言本身使得社会存在。语言形式使人类聚合在一起,是所有关系的基础,因此建立了社会。” (Benveniste, 1985, p. 240) 语言构建了社会,事实上,本维尼斯特是以语言与社会这一组关系为例子来讨论语言与意义何者为先这一核心问题的。本维尼斯特认为语言构筑了意义,因为社会——“意义”的总体,已经从外部(社会)转向语言的内部,语言就是意义本身,主导了社会的存在。在《普通语言学的问题》(*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一书中,本维尼斯特提出了“语言的主体性”(Subjectivity in Language)这一判断:“‘自我’是通过言说而存在的。(‘Ego’ is he who says ‘Ego’)” (Benveniste, 1971, p. 224) 本维尼斯特解释道:“正是在语言中,并通过语言,人建立了自己的主体,因为语言本身在现实中建立了‘自我’(ego)的概念,它的存在就是它的现实。”(1971, p. 224) 本维尼斯特认为主体性并非人的情感或经历,而是“一种整体精神,其超越了由它整合的全部现实经验的总和,而这种总和使得意识成为永恒。尽管有些人认为‘主体性’出现于现象中或者在心理学中,我们认为“主体性”只在语言的基本特征中显现”(1971, p. 224)。不难发现,语言的“主体性”其实就是“语言作为本体”,更确切地说本维尼斯特要论证的是“语言是作为本体的主体”,在其中,“本体与主体”在语言中得到了统一。就两种类型的科幻小说意义产生的根源而言,模仿与创造的界线之所以是模糊的,是因为符号与意义之先在性争议依然无法通过符号学解决。

### 三、诠释学与符号学的相遇:意义的起源与符号的作用

以上问题迫使我们回到更根本之处来思考更为普遍的现象,即人是如何理解现实世界中的意义的?这一问题在符号学领域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符号学的基本假设就是符号是指示意义的媒介。的确,符号学的这一理论基础在经验世界中不言自明,在生活世界中,符号是无处不在且多种多样的。譬如,视觉符号有交通灯、建筑物、油画和衣服等,声音符号有电话铃声、歌声和

动物的鸣叫等；甚至味觉也是一种符号，辛辣的感受、甜的味道或食物的某种温度。基本上，我们所感知到的一切都可以被称为传达意义的符号，这些外在符号不仅刺激人的感官，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意义或文化。

然而，上述前提却隐含着潜在的问题。在现实世界中，这些符号与我们的关系并非是认知性的，而是应用性的。当一个人看到某种符号，譬如桌子，他识别这一符号的过程并非是认知过程，即他首先认出“它是一张桌子”，然后得出结论“我可以在上面吃饭”。相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用桌子吃饭、打牌或工作是一件不需经过思考的事情，换言之，我们与符号的关系不存在“认出符号和其对应的意义”这一过程。然而在思考“这是一张桌子”或“这是红灯”之前，我们自然而然地就开始“使用”这些符号或对它做出反应。同样，这也是我们“使用”自行车、炊具或衣服等符号的过程。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的，那就是当使用的对象出现问题时，如自行车骑不动了，人才开始通过自己的认知能力来查看符号作为一个对象的作用方式。

由此，在使用符号之前，一个意义域就已经存在了，它可以使人们不必通过认知就能“使用”符号。那么，此种意义域是如何生成的？本维尼斯特认为，语言符号是意义域产生的根源。他在《普通语言学的问题》中之所以拒绝把语言比作工具，正是因为他判定“工具论”必然引发以下问题：“事实上，把语言比作工具——应该是一种物质性和可理解的工具一定会招致我们的怀疑。”（1971，p. 223）意义不在语言之外，而在语言之内，本维尼斯特判定意义是符号与语义的结合；语言一旦“说”，它就建构了社会和自我（Ego），建构的主体不是把语言当作工具的人，而是“整体精神”。同时，作为“整体精神”的意义是只有通过人的语言而非其他媒介才能够被传达。换言之，意义是语言中的一个特征（property）的显示，在这一过程中，普遍性（意义）和特殊性（人所使用的语言）得到了统一。

本维尼斯特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统一了语言符号与意义，并似乎解决了先在性的问题。然而，本维尼斯特把语言作为一个可以自我诠释的，融合特殊性和普遍性的“本体”，依然无法从最本源的地方进入先在性的问题，因为正如我们前文所论，人们与日常世界打交道的方式是“使用”而不是“认知”，而一旦进入语言符号层面，就开始“认知”了。因此，即使把符号与语义结合，并把语言作为本体依然没有深入符号学理论最本源的地方。

因此，在意义的生成方式上，我们以诠释学所提出的“呈现”这一概念与符号学理论汇通。在《存在与时间》中，马丁·海德格尔指出：“语言的存在在本体论的基础是话语（Das existenzial-ontologische Fundament der Sprache

ist die Rede)。”(Heidegger, 1967, p. 160) 海德格尔提出的两个概念——“话语”(Rede)和“言说”(Sprache)——可以与索绪尔提出的“一般语言”(langage)和“个人语言”(langues)进行比较。两组概念之间最大的区别是海德格尔为言说(Sprache)寻找到了存在论的基础。海德格尔认为存在(Sein)就是话语(Rede)以存在者(符号)展示意义的方式,言说(Sprache)其实是“呈现”的一种隐喻说法。言说的主体非具体的人,或者说人是话语展现自身的“用”(brauch)——这一点与本维尼斯特有着相似之处,因为海德格尔关注的并非“关于”(über)语言的问题,而是“从语言而来”(aus, von)的含义。海德格尔在后期把“Ereignis”理解为“寂静的展开”正是在此意义上的延伸。

因此,海德格尔认为,对存在者(符号)的理解和解释是存在者(符号)的基础,即应该讨论的是符号以何种方式被存在者(人)理解,被解读出意义,这一点与符号学的交流理论有着相似之处,但不同在于,交流理论把其研究范围限定在经验世界中。海德格尔论道:“世界是一种与人心智状态相适应的可理解性展示自身,这种展示过程就是话语(Rede)。可理解性的意义总被词语表达。对意义而言,词是不断地增多的。但是表示实物的词并没有被赋予意义。”(Heidegger, 1962, p. 204)海德格尔的意思是,经验世界中的语言之所以是有意义的,只是因为它本身就包含着意义,而阐释(auslegend)本身的意思就是把已经存在的意义展示出来,因此,阐释不是把语言作为工具来赋予外在的和人为的意义。

因此海德格尔指出:“话语的表达方式是语言。语言是词汇的整体——这一整体性源自话语以‘世界’表达自身;作为在世存在中的一个实体,整体性因此变成我们可能会遇到的应手之物的前提。语言可以分解为应手性的词汇。话语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语言,因为实体根据意义(significations)清晰地展开,具有‘在世存在’——一种被抛并屈服于‘世界’的‘在世存在’的性质。”(1962, p. 204)在此段陈述中,海德格尔提出了几个重要概念:“应手之物”“在世存在”和“世界”。这些概念说明了人们所“使用”的符号作为整体性话语展示意义的“应手之物”,也是被意义渗透的。汉斯·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语言不仅仅是人类在世界上的所属物,而是取决于人类所处的世界。”(Gadamer, 1994, p. 440)语言不是人的“发明”和“建构”,世界也不再是语言的对象。相反,知识和陈述的对象总是被包围在意义世界的整体性中。人类对世界的体验是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自身存在的世界正在被客体化。

诠释学把“解释”视为“呈现”，这与符号学区分能指和所指有相通之处，二者都是讨论意义通过符号或存在者被“表达”和“呈现”的过程。如果我们不把符号学视为某一种理论，而是转而向其中更基本的问题进发，即“意义是如何被理解的”，就会发现符号学中的模仿和创作，即符号与意义的先在性之争就可以告一段落，因为，如果我们把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而写出的文学作品理解为一种“呈现”，那么模仿和创作都是最广义的“呈现”。如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讨论宗教圣象作为一种符号如何揭示“精神中已经存在的东西”时所言：“在作为最切近地最直接地启示上帝的宗教里，表象的形式和反省的有限思维的形式并不是上帝存在于意识内的唯一形式，但是它却必须显示其自身于这种形式内，因为只有这种形式对于宗教意识才是可理解的。”（1983，p. 70）圣像作为一种符号，其传达的意义是精神本身中就蕴含的。换言之，对作为符号的圣象的理解就是对先在性的精神（意义）本身的理解。

将诠释学与符号学汇通之后，我们发现，符号学所要面临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过经验世界，因此，符号学的理论就不就能够仅仅满足于作为一种工具性的批评理论。换言之，符号学不是一种构建的工具，它不应以一种统一的方式收集经验，并进行统一的处理，这种符号学的理论构成是有局限性的，它依附于某种条件和假设。相反，未来符号学的发展要向发现意义世界和人类基本生活方式的方向行进，并以此为基础。

## 结 论

本文始于讨论自古希腊而来的模仿和创造之争。在古希腊时期，二者之争不是理论之争，而是通过两种理论讨论“人应该怎样生活”的最高哲学。随后本文回溯到符号学中意义和符号的优先性问题中，并以21世纪中国两类科幻小说为例，讨论文本是如何通过语言符号表达意义的，进而发现，诠释学和符号学的相遇和汇通将为符号学的未来可能方向打开边界。那么，21世纪的科学小说是模仿还是创造？从诠释学和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为我们探索意义的起源开辟了一条更为深刻的道路。在本文看来，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科幻小说是最广义意义上的模仿。然而，科幻小说不是模仿现实世界中的对象或现象，而是以其独有的方式通过语言符号理解和呈现意义世界。换言之，科幻小说不是作家通过语言符号“创作”的另一个世界——如现代小说家们所宣称的，而是展示“已有的”意义。因此，符号学与诠释学的相遇将导致符号学重新审视自身的基础，并将其从经验领域的边界推向形而上学。

引用文献:

黑格尔 (1983). 哲学史讲演录 (第一卷) (贺麟, 王太庆,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刘慈欣 (2008). 三体. 重庆: 重庆出版社.

Benveniste, É. (1971).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he original French version, under the title *Probleme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 was published in Paris, 1966). Coral Gables, FR: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Benveniste, É. (1985). *Semiotics: An introduction anthology*. Robert E. Innis (Ed.).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 A. (1991). *Trans and notes, The republic of Plato*.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Eco, U. (1978). Semiotics: A discipline or an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 In Tomas A. Sebeok (Ed.). *Sight, sound, and sense (76-77)*.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Gadamer, H-G. (1994). *Truth and method*. Donald G. Marsha (Trans.). New York, NY: Continuum.

Heidegger, M. (1962). *Being and time*. John Macquarrie & Edward Robinson (Trans.). 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Heidegger, M. (1967). *Sein und Zeit*. Tübinge, DE: Max Niemeyer Verlag.

Lucas, D. W. (1968). *Aristotle poetic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ss, W. D. (1924). *Aristotle's metaphysic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周海天, 博士, 上海大学讲师, 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比较诗学。

**Author:**

Zhou Haitian, Ph. D., lecturer of Shanghai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ields are literary theory and comparative poetics.

E-mail: zhouhaitian\_126@126.com